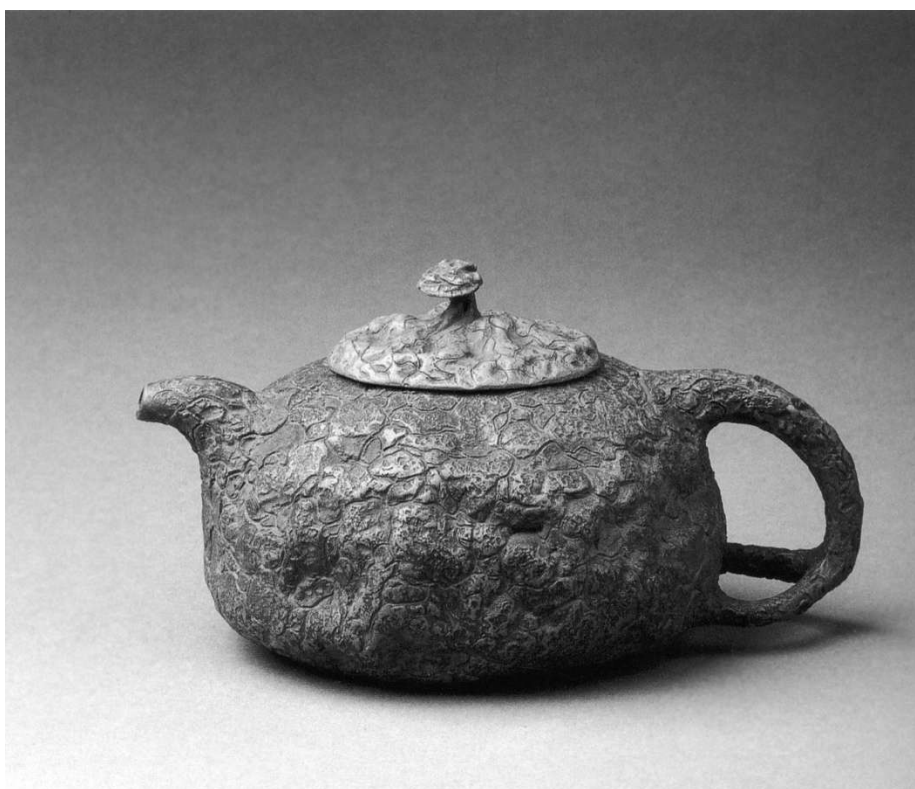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世间茶具堪为首”

——国家博物馆藏供春款树瘿壶的故事

吕伟涛



[明]供春款树瘿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量并不大,但也不能就此说世间已无供春壶。根据明人文震亨《长物志》的记述,其中有“供春最贵,第形不雅,亦无差小者”的评语。尽管文震亨对供春壶的器形评价不高,但他应该是见到过真正的供春壶,否则如何将供春与时大彬相比较。毕竟文震亨所处的时代是在明末,要比吴萼与张廷济要早出很多年,而且其家境优越,或许比同时代的周高起更有机会看到真正的供春壶。

国家博物馆藏供春款树瘿壶

相传宜兴实业家储南强所收的树瘿壶,因壺下有“供春”二字铁线小篆刻款,被认为是现存唯一的供春传器。此壶目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,以外形似银杏树瘿状而得名,高10.2厘米、宽19.5厘米,壶身作扁球形,泥质成素色,凹凸不平,古拙满身,纹理缭绕,寓象物于未识之中,大有返璞归真的意境。

储南强,字铸农,又名青绂,别号简翁,宜兴人。早年热心教育事业,在乡里兴学,先后创办“知新小学”“劝学所”等。民国初期,被推举为宜兴县民政长,曾两任南通县知事,并三度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。执政期间多有建树,深受地方拥戴。50岁时,登报声明脱离仕途,专心投入宜兴古迹善卷洞、张公洞的保护开发。

关于树瘿壶的流传经过,储南强自有记述:“强上年(1923年)客吴门,忽邂逅得供春壶。壶为山阴傅权氏所藏。傅之前,藏西蠡费氏(费念慈)。西之前,藏斋翁(吴大澂)。又前出于沈韵初。沈之前,尚待考。昔日吴兔林(吴萼)著《阳羨名陶录》,搜罗甚广,而未见供壶。张叔和(张廷济)见壶亦多,而《清仪阁杂咏》尤叹息供壶世已无有。乃神物忽来,重返故里,宁不可庆。将来拟于西溪上建春归阁以贮之。先乞君(潘稚充)篆印为券。君篆竟,亦自喜为得意之作。”

由于壶盖久失,吴大澂当年曾请黄玉麟配制过。壶归储氏后,因为配盖和壶制不称,他便携带到上海,商诸黄宾虹,请当时名手裴石民另配,即现存的壶盖。盖的外沿,有制印师潘稚亮镌刻的两行隶书铭文:“作壶者供春,误为瓜者黄玉麟。五百年后,黄宾虹识为瘿,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,重为制盖者石民,记记者稚君。”

储南强在得到供春壶后,还请潘稚亮刻了一方“春归”之印,寓意供春归来,并拟于家乡西泠建春归阁珍藏,留有《清潘稚亮刻“春归”二字而作绝句》为证。后因时局动荡而计划搁浅,为避免外人觊觎掠夺,遂携壶而隐。

1952年,储南强把一生所有集藏捐献给国家。其在《储南强捐献所藏珍物简目》的跋中写道:“本人以年齿就暮(时年77岁),子孙皆效力公家,无继续之意愿。若举赠好友,或苦于不均;安置名山,又不易保障。遂乘各地提倡保护文物之际,决于贡献本邑社团。一生下世,便算收场……物皆稀世,愿共视而珍;艺有专长,皆卓绝于今古。”

据了解,当初储南强与苏南文管会洽谈,30件珍品悉数由苏南文管会接收后转至南京博物院。其中的一件紫砂项圣思款桃杯仍在南博,已成为镇院之宝。而国宝级文物供春款树瘿壶则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,供世人瞻仰。

疑云重重

现在谈到供春壶,大家必举树瘿壶作例子,但是这把壶的鉴别问题,仍不免有所争议。这把供春款树瘿壶现世后,又陆续出现了多把同类款式的供春壶,这种雨后春笋般的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。

与此同时,人们从供春款树瘿壶的泥料质地、制作工艺、壶型大小和烧成等方面提出质疑,认为均不符合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供春壶的艺术特征。而这把壶在被储南强收购之前,确实曾辗转被多人收藏。

早在1937年,李景康、张虹合编的《阳羨砂壶图考》中便记有此壶,直言“吴恣斋所仿者俱此式”,又说“然以龚(供)春之价重,仿造者必众矣”,暗示储氏的树瘿壶出于吴大澂或后人的仿制。《宜兴县志》亦载,黄玉麟在吴府“得观彝鼎及古瓷器,艺日进,名亦益高”。况且,这把供春款树瘿壶的壶盖为黄玉麟所配。种种迹象表明,此壶的作者很可能是黄玉麟,而非供春。

当代紫砂大师顾景舟先生原来一直认为供春款树瘿壶是真品,但在其弥留之际又说是黄玉麟所作,其《宜兴紫砂艺概要》一文写道:“这里要旁及一个问题,就是黄玉麟所制供春壶,大半个世纪以来,引起中外砂艺爱好者莫大的轩輊,弄得好事者穿凿附会,大做文章,至混淆视听,以讹传讹。”

听,以讹传讹。”

当代另一位紫砂大师徐秀棠先生在其著作《宜兴紫砂五百年》中,对供春款树瘿壶有着更为透彻详尽的分析与判断,亦提出了质疑。

一时间,这把供春款树瘿壶的真伪问题,变得疑云重重。

壶供真茶

正是因为供春在明清以来文献中久负盛名,其壶又难觅踪迹,更使紫砂壶“正始”的历史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。恰恰在上世纪供春款树瘿壶现世之际,对该壶考辨的同时,对供春其人的质疑也随之产生。

民国时期李景康、张虹合编的《阳羨砂壶图考》一书首先发难,在其《雅流》篇中谈到吴仕时写道:“然供春仅一家僮,能作树瘿、仿古诸式,款识‘供春’二字亦书铁线小篆,倘非顾山研求式样,代为署款,恐难臻此。《壶系》以顾山小传附于供春传,以主附仆,体制究有未安,今特拨置雅流壶艺之首,想为有识者所耻也。”

这是自明代周高起《阳羨茗壶系》以来,对供春作为年少书僮能成就砂壶创始之功的第一次质疑。而此前出现的相关文献,仅是文震亨《长物志》对供春壶器形的不满。

上文提及的顾景舟先生,是当代可与时大彬、陈鸣远、邵大亨等历史上的紫砂大家相比肩的一代宗师,他不仅精于壶艺,也精于鉴赏。顾先生对供春壶有着独到的见解,其一生过眼的供春款树瘿壶有13把之多,在仔细鉴别之后断定它们均非真品,甚至进一步认为“供春”仅为壶名而已。高英姿所著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》一书中,对此有所解释:“顾景舟曾指‘供春’或为壶名,非人名。类似有‘春供’之意。又或此供春壶式仅为寄托对初创者的纪念。生前一直在作相关考证。”

不难看出,顾先生不仅认为传世的供春款树瘿壶为黄玉麟所制,而供春作为紫砂壶“正始”也是值得商榷的。遗憾的是,这种见解一直未能形成研究文章面世。

另一位从理论角度对供春和供春壶提出异议的,是原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宋伯胤先生,他曾在《试论宜兴紫砂陶器产生的历史背景》一文中,首次明确提出“供春绝非砂壶创始者”和“供春制器疑点多”的学术观点。

更为深入的研究,则是徐鉴润先生,他对其家乡宜兴怀有极深的感情,晚年致力于紫砂文化研究。其观点认为“供春”是壶名,而非人名,因此并不存在“供春”其人。其在《供春壶史初考:吴仕书僮真名朱昌而“供春”为壶铭绝非人名》一文中,以大量的篇幅,以及许多此前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来证明供春其人并不存在,并指出吴仕在紫砂初始历史上的巨大作用。他认为,“供春”之意,乃是指“壶供真茶”。所谓“真茶”,即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辛未(1391年)九月十六是下诏废团茶而改贡的叶茶。又或许,“供春”二字的灵感取自吴仕好友沈周《落花诗》中的“供送春愁到客眉”。“供春壶”实为吴仕在大湖山福源寺(而非前人说金沙寺)读书期间,与其密友王用昭,以及陶工们合作而制成的用于泡茶的样品壶,然后提供给陶人仿制的。而为何假托书僮“供春”之名?一是因为“百工技艺”非士人所为,避免与之牵涉;二是忌讳当时以“煮茶”为业之人的报复。

供春壶之名来源为何,这些问题倒也没有必要深究。无论如何,“供春壶”的“世间茶具堪为首”的文化价值都是不可否认的。

(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)

明朝,中国的饮茶之风从唐宋以来的华丽精致转变为自然淳朴,所饮之茶也由团茶转变为散茶。因此,“既不夺香,又无熟汤气”,适合冲泡的宜兴紫砂异军突起,盛极一时,士人品饮多以陶壶为风尚。

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把供春款树瘿壶,它的身上不仅凝结了“世间茶具堪为首”的文化价值,它的故事也非常吸引人。

“正始”大家

在紫砂壶历史上,被视为“正始”大家的供春无疑是一位最具传奇性的人物。根据明人周高起《阳羨茗壶系》所載,“供春,学使吴颐山家青衣也”,“世以其孙龚姓,亦书为龚春”。“青衣”在古代意指婢女,因书僮常着青衣,亦可指谓书僮。

吴颐山即吴仕,字克学,一字颐山,号拳石,宜兴人,正德九年(1514年)进士,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,著有《颐山私稿》传世。早年“颐山读书金沙寺中,供春于给役之暇,窃仿老僧心匠,亦淘细土抟坯,茶匙穴中,指掠内外,指螺文隐起可掬,胎必累按,故腹半尚观节腠,视以辨真”,其壶则“今传世者,栗色暗暗如古金铁,敦庞周正,允称神明垂则矣”。

继《阳羨茗壶系》之后,吴颐山的侄孙、清代文人吴梅鼎作《阳羨茗壶赋》赞曰:“彼新奇兮万变,师造化兮元功。信陶壶之鼻祖,亦天下之良工。”

自此,一举奠定了供春作为紫砂壶“正始”的历史地位,并被此后的紫砂艺人和文人墨客所推崇,其盛名至今不衰。

供春的传奇在于他是以一个天才童仆的形象而进入紫砂历史的,而更为奇怪的是,他的形象就此凝固,仿佛是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。在后来相关的记述中,并没有更多的关于这个紫砂“正始”大家的新的线索,而这显然非同寻常。

不过,今人韩其楼在其《紫砂壶全书》中倒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,大概是以周高起《阳羨茗壶系》所记为蓝本。在谈到供春与供春壶时,他进一步写道:“有一次,供春做的壶被主人吴颐山看到了,以为质朴古雅,便叫供春照样再做几把,一面又请当代名流加以鉴赏。没过几年,供春竟然出了名,他的作品为时人所珍爱,收藏家竞相搜寻。从此,供春就离开了吴颐山家,摆脱了仆僮的生活,专门从事制陶事业。他的制品也被称为‘供春壶’。”

事实上,我们不但对供春其人了解甚少,对供春所制之壶的认知亦缺乏。即便是《阳羨茗壶系》的作者周高起,也没有见过真正的供春壶,他只是从吴仕裔孙吴同卿的书斋“朱萼堂”看到了时大彬所仿制的“供春式”砂壶作品。同样,《阳羨名陶录》的作者吴萼也自叹福薄,无缘一睹供春壶。还有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、书法家张廷济,一生好收藏,阅壶无数,在其所著《清仪阁杂咏》中也称自己无缘一睹供春壶真容。由此可见,供春所制之壶存世的数

荣宝斋“翰墨家国”专题展 再现老字号辉煌历程

本报讯(记者 付裕)“翰墨家国——荣宝斋350周年专题展”日前在北京荣宝斋大厦开展,此展全方位回顾了荣宝斋的发展历程。

1672年,从一家南纸店开始,经历350年砥砺前行,一步一步发展壮大,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,荣宝斋为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繁荣艺术品收藏及交易市场,发挥了巨大的作用,逐渐发展成为集画廊、拍卖、文房、非遗、出版、展览展示、美育教育、电商文创、数据资产孵化运营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化文化央企。

国”为主题,分成七个板块:翰逸云程——荣宝斋350周年文献展、匠心神韵——荣宝斋非遗精品展、几案山林——荣宝斋馆藏文房用品展、墨彩华章——荣宝斋馆藏书画精品展、书以名存——荣宝斋出版精品展、百花献瑞——荣宝斋当代名家邀请展、文以代兴——荣宝斋业态创新成果展。

荣宝斋350周年文献展,陈列题字、题词、信札、匾额等珍贵史料。荣宝斋馆藏书画精品展,展出了100余件古代和近现代书画精品,如隋末唐初的《妙法莲华经卷第三·化城喻品第七》、元代盛懋的《清溪渔者》、明代文徵明的《兰竹图》卷、清代八大山人的《涉事册》,近现代齐

白石、张大千、吴昌硕、黄宾虹、李可染等众多艺术大师的珍贵作品。

荣宝斋馆藏文房用品展,展示了荣宝斋馆藏的文房四宝与篆刻印章的精品,如明代的五彩毛笔、方形玉印盒,清代的山形玉笔架、玛瑙笔架,以及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陈师曾等名家篆刻,尤其是荣宝斋的“镇斋之宝”——“田黄石”、清和硕怡亲王田黄对章等更是难得一见。

荣宝斋当代名家邀请展展示了黄永玉、范曾、韩美林、崔如琢、吴悦石、王镛等100余名当代书画名家创作的精品近200件,体现了传统与时代精神,展现了新时代“书画家之家”的风貌。

荣宝斋非遗精品展展示了荣宝斋的两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木版水印技艺和装裱修复技艺的发展历程和重大成果,代表性木版水印作品有《簪花仕女图》《就国夫人游春图》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等。展览结合木版水印装置、影像、互动等情景式体验方式,全景呈现这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传承的百年历程,回顾荣宝斋为弘扬民族文化、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做出的不懈努力。

荣宝斋出版精品展,展示了荣宝斋出版的重点图书。如《荣宝斋画谱》系列、《中国书法全集》系列、《老一辈革命家书法选》系列、《荣宝斋珍藏》《黎雄才全集》《赖少其全集》《黄宾虹文集全编》和《荣宝斋》期刊、《艺术品》期刊等,充分展示专业出版社的品牌特点和文化影响力。

荣宝斋业态创新成果展甄选了荣宝斋文创产品和数字衍生、跨界合作、沉浸式体验等近30件展品,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新时代的荣宝斋充分发挥自身“国家画廊”的优势,积极推动文化和艺术融合发展,满足公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。



“万婴之母”林巧稚

本报记者 照宁



厦门市鼓浪屿东南部的复兴路上,有一座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纪念园“毓园”,以纪念一位“伟大的母亲”——林巧稚。

林巧稚(1901—1983),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,鼓浪屿的伟大女儿。她一生未曾婚育,却亲手接生了5万多个新生命,被誉为“万婴之母”。

少女立志愿为良医

1901年12月23日,林巧稚出生在厦门鼓浪屿晃岩路47号的一个教师家庭,她6岁时接受启蒙教育,12岁就读于海滨女子师范学校,时称“上女学”,鼓浪屿许多大家闺秀均毕业于此。林巧稚从小学到中学,敏而好学,学习和品格都表现突出,1919年,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,时年18岁。

1921年,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上海招生,林巧稚与女友一同赴上海应试。可是正当考试就要结束时,女友突然晕倒在考场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,林巧稚没有多想,不顾自己还未答完的试卷,毅然前去照顾女友。这一舍己助人的行动被考官看在眼里:这不正是一个医生应该具有品德吗?林巧稚的行为深深打动了考官,加之她英语娴熟而准确,虽然没有答完试卷,她还是被北京协和医学院破格录取,从此走进了医学殿堂。

1929年,林巧稚经过8年苦读,闯过了当时淘汰率高达40%的竞争,不仅获得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,还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。毕业时,林巧稚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妇产科医生,成为协和医学院第1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,从此开始了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。

1933年,她赴英国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进修;1939年,又赴美国芝加哥医学院进修。回国后的林巧稚担任了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,并兼任北大医学院教授。

从那之后,她在产房里度过了60多个春秋,亲手迎接了5万多个小生命来到人间。傅作义的小儿子、冰心的3个孩子、梁思成的2个子女、院士袁隆平等都是由林巧稚接生的。

医者仁心爱无止境

林巧稚从小就确立了一个

理想:怀着非凡的爱做平凡的事。1941年,侵华日军强行关闭北京协和医院,她便在北京东堂子胡同10号租了几间房子开办私人诊所,挂牌行医继续医治病患,经常为穷人免费施诊。

从1942年4月小诊所开业到1948年5月北京协和医院恢复,6年的时间,在那个小小的诊所里,填写了8887份病历。她教育妇产科的所有人:“救活一个孕妇、产妇,就是救活了两个人。”在那个缺乏食物的动荡年代,林巧稚坚守本心,医治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到来,为一户户饱受苦难的家庭带去了希望。

朱德夫人康克清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写道:“林巧稚看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论病人是高级干部还是贫苦农民,她都同样认真,同样负责。她是看病,不是看人。”百姓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恩,就把林巧稚接生或资助过的婴儿取名“念林”“爱林”“纪林”,以示对林巧稚的永久纪念。

妇科先驱奉献毕生

林巧稚热爱祖国,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联系在一起。她深刻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,她和许多爱国的科学家一起毅然留在祖国为人民服务。她为新中国妇产科学事业的发展投入了所有的精力与热情,攻克新生儿溶血症,大大提高了新生儿的存活率;组织大规模子宫颈癌的普查和防治,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宫颈涂片检查,使子宫癌的死亡率大大降低;主编了多本妇科学术著作及科普读物,在缠绵病榻的最后3年里,她仍坚持参与《妇科肿瘤》的编写,该书浓缩了林巧稚毕生对妇科肿瘤的探索和研究,记载了她为医学事业所尽的最后一份力。

1961年,林巧稚回鼓浪屿小住了半个月,这是她自年少离开后唯一一次回故乡看望乡亲。1983年4月22日,林巧稚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,享年82岁。冰心老人在《悼念林巧稚大夫》一文中写道:“她是一团火焰,一块磁石。她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,是极其丰满充实地度过的。”1983年,有关部门为表彰和纪念林巧稚对中国妇产科医学作出的杰出贡献,在她的家乡鼓浪屿修建了一座“毓园”,“毓”取培育养育之意,故纪念园取名“毓园”,供人瞻仰凭吊。

林巧稚的墓志铭上镌刻着:“只要一息尚存,我存在的场所便是病房,存在的价值就是医治病人。”这正是她一生所求,也是她的生命写照。邓颖超亲手在她的塑像旁种下南洋杉,以纪念这位中国卓越的妇产科医生,伟大的母亲——林巧稚。



《兰亭雅集图》



《兰亭雅集图》(局部)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东晋永和九年,当时的文人名士王羲之与谢安、孙绰等相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水边,众人临水赋诗,由王羲之作序书写,《兰亭集序》就此诞生。这场盛会也成为历代画家们喜爱的创作题材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《兰亭雅集图》为李宗谔所绘,此画生动再现了兰亭雅集的盛况,颇具观赏之趣。李宗谔,号小樵,明代福建永安人,工人物,间写山水,白描尤精雅。